

大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^{*}

张济顺

摘 要:1949年以后,上海社会的革命改造天翻地覆。隐藏在革命背后的都市文化取向与日常生活趣味,未必都荡涤殆尽。从史学的视角考察王承志的《同和里》、王安忆的《启蒙时代》以及金宇澄的《繁花》三部小说呈现的若干场景,就会发现新旧上海之间不仅有断裂,而且也有延续,即使在大动荡年代,上海摩登也以隐匿的方式顽强地生存。历史的记忆与文化惯性,与上海人急速的代际更替相伴前行,构成上海文化最基底的力量与品格。

关键词:重构延续性;动荡年代;上海摩登

DOI: 10.16382/j.cnki.1000-5579.2019.05.023

有些年了,对上海文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。“没文化的都市”是一个极端的表述,此说虽不无偏激,但它并不是就狭义的文化而言,更不是指某些文化现象,而是对上海“大历史”的批判与前景的担忧。

“没文化的都市”来自两个向度的比较:一是时间的向度,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“魔都”为“怀旧样板”,叹“今不如昔”,上海都市文化的活力不再;一是空间的向度,以“有文化的村庄”北京“帝都”为今日参照,指上海城市巨大的磁力逐步丧失。

尽管这两个向度的比较在学理上并非无懈可击,但都明确地指向1949年以后三十年上海的历史之责:计划经济的“堡垒”、人口流动的户籍“壁垒”以及消费大都市变工业大基地的城市转型等等,阻断了现代上海的进程,形成了历史的断裂。我的“重访”就是想链接这段“断裂”的历史。

张济顺:《远去的都市:1950年代的上海》^①,所抱的学术旨趣是重新探讨1949年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,试图打破1949年的鸿沟,重构历史的延续性。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讨论,我也在不断地追问。借此机会,我借助三部小说——王承志的《同和里》^②、王安忆的《启蒙时代》^③以及金宇澄的《繁花》^④所得的阅读体会,从历史学者的视角,就“动荡年代的上海摩登”,对“延续性”再作延伸思考。

一 何为延续性

有许多的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,主要的是断裂或者说是转型,是“天翻地覆”的历史巨

【作者简介】张济顺,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(上海,200241)。

* 本文系作者在“记忆·空间·治理:城市研究的多维视野”高端论坛上的主旨发言稿。

① 张济顺:《远去的都市:1950年代的上海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5年。

② 王承志:《同和里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7年。

③ 王安忆:《启蒙时代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年。

④ 金宇澄:《繁花》,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年。

变,因为社会文化的延续性是不言而喻的。我就反过来想,难道这个“延续性”是一个伪命题吗?的确,社会文化的延续包含不言而喻的很多问题,“转型与延续”也可以是历史变革一以贯之的主题。但是,为什么对于这三十年的研究就变得如此重要?

我认为,这个“延续性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的延续,而是指延续性的重构,是在承认1949年是历史传捩点的基础之上的,丝毫无淡化和忽视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建政过程中“改男造女态全新”的一面。

然而,所谓“延续性”不等于“相似性”,更不等于“重复性”,而是要凸显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,正如鲁迅所言:“看中国进化的情形,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: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,即是反复;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,即是孳杂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?那也不然,只是比较的慢,使我们性急的人,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。”^①因此,重构“延续性”的焦点应在于考察“延续当中怎样发生转型和裂变”,即“历史的非凭空创造和有负担前行”。^②

从历史叙述来说,这种非断裂又不是和所谓的红色、黑色叙事完全没关系的另一种叙事。它不是在红、黑之间,也不是仅仅讨论民国与共和国之间的相似性,更不是简单地褒贬相加或折中一下,而是在一种红色和黑色的背后,在大转折时期的历史互动、交集、纠缠、渗透的场景中,巨大的革命洪流之下、之外的那些隐秘的潜流、支流,去发现深藏于社会深处的那个不变的基底性力量,即所谓“执拗的低音”。

人们不容易发现或承认这躲在社会深层的不变的底子,但它确实存在,确实延续着历史。1949年以后,隐藏在上海都市社会文化背后的文化取向、日常生活趣味和美感,社会网络和自主性都真的消失殆尽了么?我觉得无论是文学(特别是非虚构),还是历史档案、田野调查与口述史,提供的答案都是未必如此。这就是我要深究的断裂与延续的问题。

二 大动荡中的灰色场景

(一) 谁革谁的命

近年来,在史学界有一股“新革命史”的研究取向,主张重新阐释20世纪的中国革命。重新阐释之一的意义是强调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连续性,不仅每一次革命之间如“高山滚石”般地不断递进,而且“革命与反革命”的不断翻转是一以贯之的主题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“谁革谁的命”就不是“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”那么简约化的叙述了。

在这几部小说里我看到了各色人等的“革命面貌”,换言之,谁都可以革谁的命的。比如,《同和里》中的小皮匠忽然可以当上造反派的头头,威风一时;生产组的老阿姨又起来“夺权”,把“同和里居委会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居委会主任彻底打倒^③。这样的年代谁都可以是“革命者”,而且他们描写的“革命者”每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确实不同。比如,《繁花》里面有一段三个中学生关于“抄家”的揭秘:“学生抄家,一般是偷书,弄回去看,相互传”,“高中生、大学生走进门,带了放大镜,注意文字……尤其会研究旧信,有啥疑点,暗语,这是重点”;“工人抄家,是揩油,弄一点是一点”,“工人喜欢珍珠宝贝,大小黄鱼(指金条),银碗银筷,看得眼花缭乱,骂声不断,表面喊口号,心里发闷”^④。这些画龙点睛而又十分传神的对话,道出了是什么原因把大家都变成了“革命者”。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革命行动竟由如此

① 鲁迅: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,阎晶明编选:《鲁迅演讲集》,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年,第13—14页。

② 瞿骏:《地方的解剖术——读〈远去的都市:1950年代的上海〉》,澎湃新闻“翻书党”栏目,2015年7月26日。

③ 王承志:《同和里》,第267—273、第262—266页。

④ 金宇澄:《繁花》,第145页。

多的或宏大、或卑微、或纯粹、或含混的目的所促成。

两部小说多有“革命狂欢”中的灰暗面相的描述。无论是《启蒙时代》中的革命干部，还是《同和里》中的里弄干部，都是一夜之间完成从“革命”到“反革命”的翻转。十分典型的是《启蒙时代》中那些干部家庭，从无限风光跌入阴暗的角落。

（二）谁启蒙谁

《启蒙时代》的那群干部子弟居然是被一个他们所鄙视的“工商业者”——同学嘉宝的祖父所启蒙。还不止于此，用王安忆的话来说是那种隐秘小市民的文化力量潜移默化地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些自诩“天之骄子”的革命后代，使他们对这座城市“有些尊重”。

回到我自己对1950年代的上海提出的问题，即1949年以后上海摩登是不是就此退场？《启蒙时代》给我这个追问提供了又一个思考的契机，让我看到，即使是疯狂的动荡年代，小市民赋予上海这座城市的思想，仍是一种“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、楼型、弯曲街角的细微处理，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、华丽的格调里面”，流淌着的“正直的思索”^①。这些小说更加启发我要研究上海文化的基底性力量究竟何在？是变成“走资派”的革命干部？是他们的子女吗？还是汪洋大海的小市民，以及小市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文化？

（三）革命后的回归

过去有一种定见，似乎革命之后，总会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动。

但是，小说呈现的并非如此，底层的人经过一段疾风暴雨式的“盛大节日”之后，会突然发现这种造反，这种“革命”跟自己毫无关系。“过把瘾”之后，一切如常。众多底层百姓通过“革命”洗礼，既没有继续充当“革命者”，也没有成为“反革命”。《同和里》的“造反司令”小皮匠风光一阵之后，又回到弄堂口摆摊头时，悟到了这样一个“真理”：“小皮匠这下子脑子清爽了，周围的世界再闹猛，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硬要把关系去搭上去也是搭不牢的，你想搭别人也不让你搭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去搭。”^②我把这些归为“革命”的“灰色场景”，其中既有革命与反革命的突然翻转，也有革命向革命前社会的归位，尤其是那些原本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。谁革谁的命，在这个地带愈发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。

三 谁之上海

《启蒙时代》和《同和里》虽然前者侧重写了一群干部子弟，后者着墨于底层小市民，但有意思的是，这两部小说中的上海都是动态的，不仅是时间的流淌，还有空间的展示。比如说这些干部子弟大多都不是上海人，大多都是随着他们的父母进了上海，成了上海人。但是就像《启蒙时代》里面写到，革命虽然给予他们城市上层的优越地位，他们居高临下地藐视上海人，但他们对上海始终有强烈的疏离感。特别典型的是从小寄养在老家的干部子弟陈卓然，解放以后父母把他带到上海，开始的时候连上海话都不会说，也听不懂，心灵深处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自卑感，甚至陷入自闭。同时他又以自己的家庭出身而优越感甚强。这些人在干部子弟当中太多了，他们一般都操着带上海腔调的普通话。而那个时候在上海人的眼睛里来看凡是讲普通话的都是干部子弟，不把他们当做一般的“外地人”看待。

《启蒙时代》还塑造了另一类上海外地人形象。一是陈卓然的大姑。与陈卓然不一样，她完全没有

^① 王安忆：《启蒙时代》，第295页。

^② 王承志：《同和里》，第286页。

那种疏离这个城市的烦恼,相反却以中原地方乡村“源远流长的文明教化”,而“比较这近代城市更拥有道德资源”。因此,如她这样“上海摩登街头”的“乡下女人”,“别看她们的形象不入这个城市的潮流,但她们倒不将自己当外人的”。另一位是干部子弟南昌的父亲。这个出自江西的革命干部反对儿子去家乡插队,称自己得了一种“忘乡病”：“憎厌家乡”^①。因为家乡表征着他的“没落工商地主”的家庭出身和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身份属性。但他又很无奈,虽然他以胜利者、占领者的姿态进入了上海,但他的家乡给予的身份始终伴随着他,一直处在权力的边缘,后来干脆被打倒。说是“忘乡”却难以忘却,这是身处上海的南昌父亲对家乡的复杂心结。即使在上海资本家身上,也有乡土的文脉延续。如《启蒙时代》所述:“要知道,上海资本家脚上的泥巴还没洗干净呢,在他们养尊处优外表底下,是乡下人的耿劲”,靠着这股“耿劲”,他们闯过了所有的“大风大浪”^②。

“谁之上海”不仅是通常所指的五方杂处的移民空间,也是“革命”问题上值得深描与探究的。

如果从动荡年代推衍至更长的上海历史,“谁之上海”或许更能展现这座现代都市的气质与神韵。

历史学家定宜庄积十几年之功做成的“北京口述历史丛书”,对“老北京人的背影”,做“最后的一瞥”,她深深感叹本世纪来老北京人“最根本、最彻底”的消失是“最令人触目惊心的”,“以北京的‘人’为载体的文化,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”^③。但当她回眸历时三个多世纪的“老北京”,却仍以“超稳定”来描述京城“旗、民分城居住”的社会格局和积淀深厚的都城文化^④。从1644年清军入关,“满汉分居”,“内城”与“外城”界限分明,一直延续至清亡,甚至到1950年代初,城墙、古建筑被拆除或损毁,这个样态之变也未彻底改变社会结构——汉人居住于内城者有之,但旗人却少见居住于外城者。直至世纪之交,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,包括“北漂”在内的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,持续三百余年的“超稳定”社会结构才无以存续,“老北京”消失,或者成为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“老上海”的被淹没发生在两个历史节点:一是1843年上海开埠,或者说1854年“华洋分居”格局的被打破,老城厢的老上海人在一波一波的移民潮之中已悄然无声;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,浦东开发开放和邓小平“南方谈话”之后,外地人、外国人又一次涌向“一年一变样,三年大变样”的上海,此后二十年,又一代新上海人成了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主体。

可以说,“五方杂处”、“开放多元”一直是百年上海社会的基本格局,如此急速的新陈代谢,“什么是老上海”始终具有很大的模糊和不确定性。1949年以后虽然形成了一代颇具优越感的“上海人”,但与经历了数世纪的“老北京”相比,这三四十年的上海人实在资历太浅,更何况,他们中间的许多人,都是“志在四方”的“好儿女”。这一代人,不仅没有被人确认为“老上海”,而且在事实上,又一次淹没在“新上海”和“新上海人”之中。当今流行的“怀旧样板”,至多也就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的“上海摩登”,“老上海”不过也就一个多世纪的历史。

返回到本文开头京沪比较的话题,可以说,本有“老北京”,从无“老上海”,上海这座都市生命与活力的源泉,就在“谁之上海”这个几乎没有停歇的历史诘问。永远摩登,似应为上海都市文化最基底的力量与品格。

(责任编辑 孔令琴)

①② 王安忆:《启蒙时代》,第240、292页;第138页。

③ 定宜庄主编:《北京口述历史丛书》,北京:北京出版集团公司、北京出版社,2017年,总序,第4—5页。

④ 定宜庄:《八旗子弟的世界》,“北京口述历史”之一,序言,第1页。